

漫漫荆途

文通成立60周年纪念文集



漫 漫 荆 途

文通成立 60 周年纪念文集
1939——1999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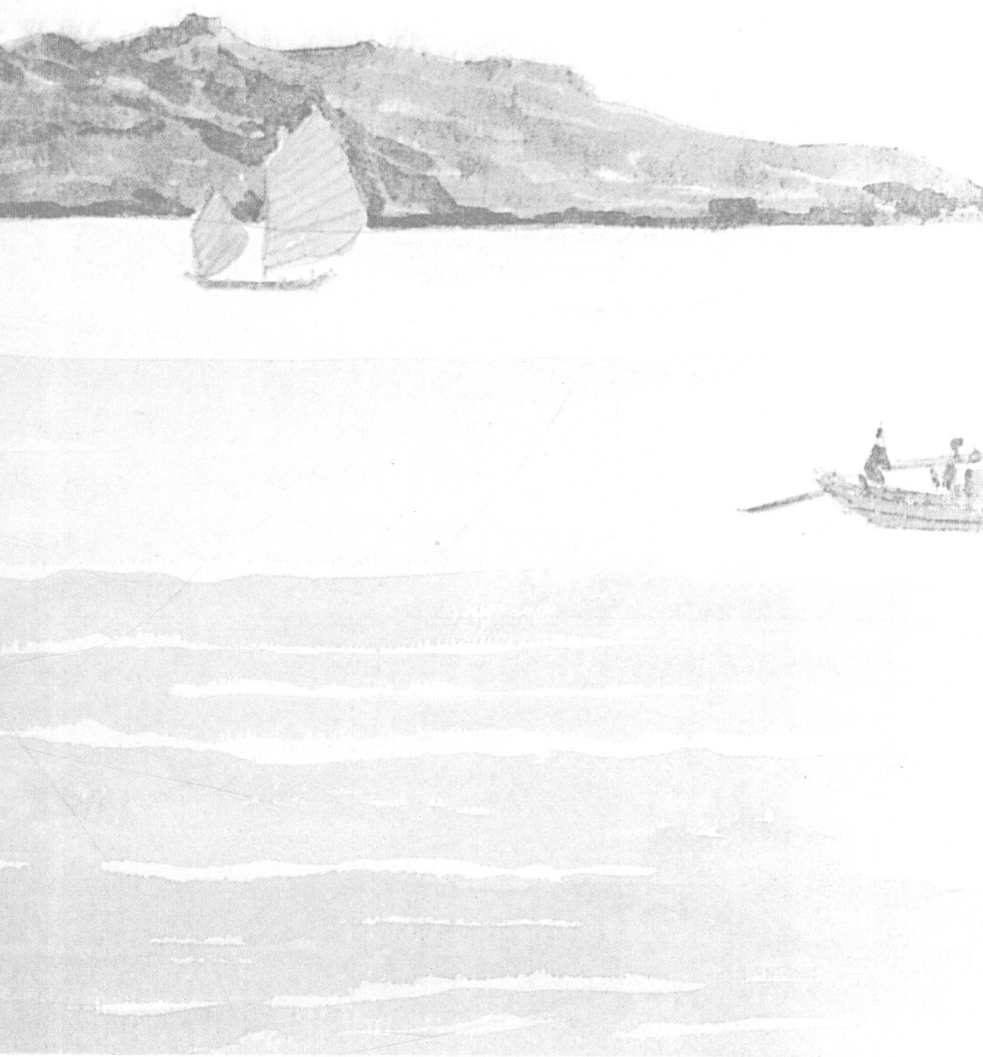
本文集编委：

戈 阳	高建民	杨煜华
林金枫	陈大耀	郭永华
肖师韩	郑 斌	吴 皓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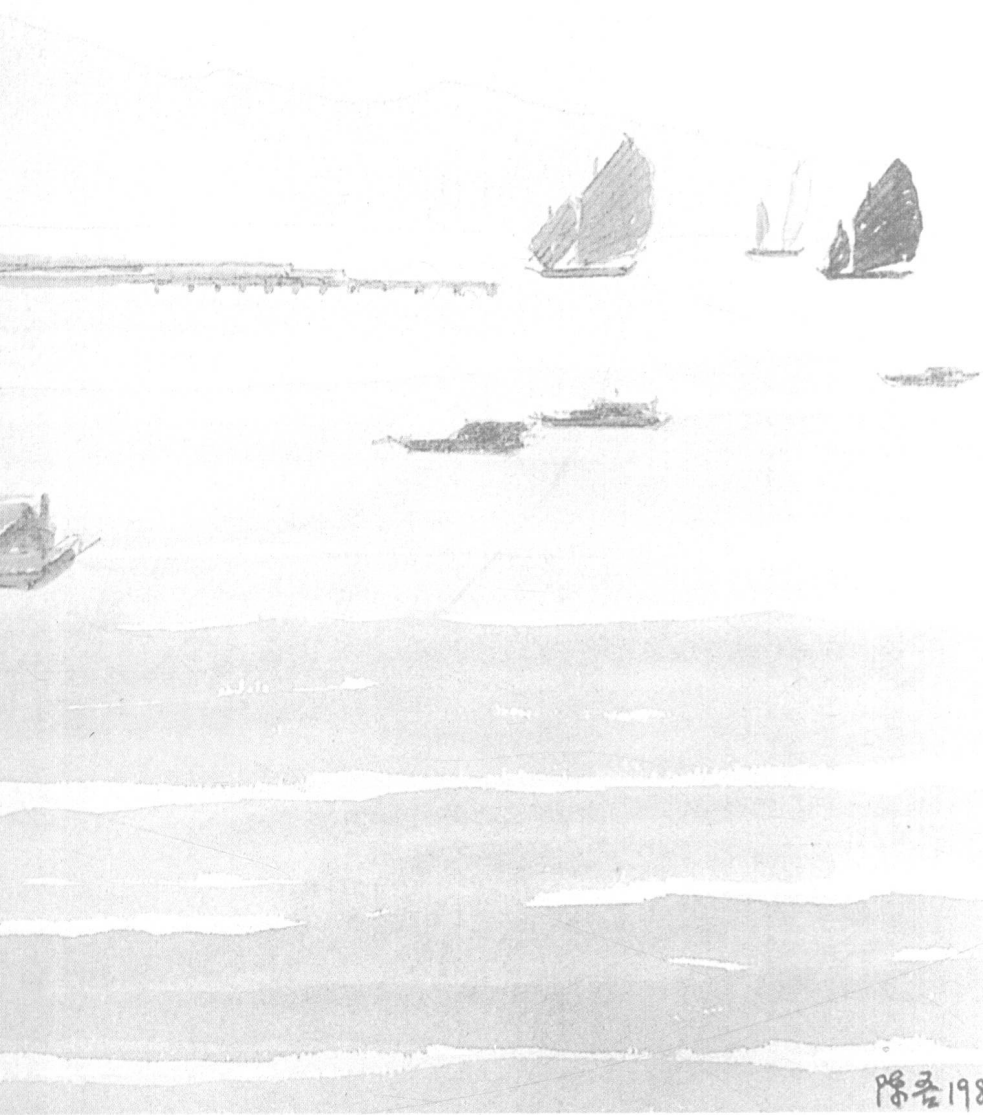
主编： 林金枫

文通学社编印

1999 年 7 月



汕头港口(水彩)



陈吾 1988



■ “文通（文研、秋风）”成立48周年在广东迎宾馆举行盛大纪念座谈会

■ 黄文俞、杜埃、张岳强、黄焕秋等，在“文通”成立48周年纪念会上



■ 梁克寒、史明等在“文通”联欢会上

■ 徐迟与“文通”会友座谈





■ 犁青作品座谈会在
广州举行

■ 犁青、卡桑夫妇在
作品座谈会上



■ 黄苗子、郁风
举行书、画展，
“文通”特设午宴欢

■ “文通”会友祝贺
陈吾画展开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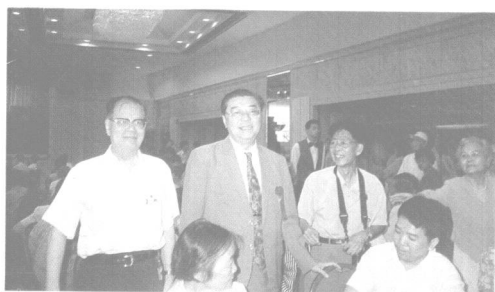


■ “文通”成立55周年
纪念会合照



■ “文通”会友参
加庆香港回归大会时
留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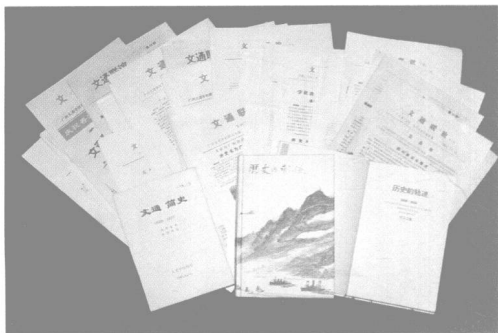
■ 郭荣昌在庆香港回
归大会上重会秋风团
友



■ 黄施民与“文通”
会友合影留念



■ 这是1947年“文通”复会时出版的会刊《文艺通讯》第三期的封面



■ “文通”复会后出版的刊物



■ 会友郊游，参观“黄埔军校”旧址



■ “文通学社”举行的定期例会

目 录

悲欢聚散、情系“文通”(代序)	戈 阳(1)
在新的革命征途上多发一分光	黄文俞(7)
与文艺结缘之后	杜 埃(9)
三点建议	黄 绳(11)
《文艺青年》的创办	郁 风(12)
杨刚墓前悼我师	王 健(13)
记在香港时一次远游兼忆杨刚先生	杨之栋(15)
1939——40 年战斗在文通的党支部 ...	陈汉华、史 野(16)
文通的第一个“新青”支部	沈 野(19)
《历史轨迹》出版盛会	高建民、林金枫(21)
浓情厚意再相逢	忆 华(24)
昔日“文通”小伙子、今日诗坛瞩目人	郭永华(28)
文通欢宴黄苗子、郁风导师	林寒冰(30)
忆“秋风歌咏团”	吴 皓、郑 斌(31)
难忘的庆典	杨煜华、郑 斌(34)
在香港青年界反迫害斗争期间发生的 几件事	郑挺生(36)
文通历史中一段插曲	陈大耀(41)
歌乐山上访徐迟	忆 华(45)
带笔从戎话当年	金 枫(48)
踏遍青山人未老	忆 华(52)
温故知新	戈 阳(56)
香港会友举行宴会、庆祝“文通”金禧大庆	李邦文(65)

新的里程碑	工作组 (66)
在香港沦陷前夕一段不寻常的经历	金 枫 (67)
一封没有寄出的信	远 威 (70)
悲喜交集的回忆——对《一封没有寄出的 信》的回响	李少芳 (72)
血与火的洗礼——忆参加淮海战役始末	史 野 (74)
文通情谊、地久天长	高 波 (77)
痛忆陈善文	罗源文、梅 林 (80)
和秦牧兄相处的日子	石泉安 (84)
满怀激情诉我心	王 陵 (86)
难忘的岁月	许真彩 (88)
文通回忆	麦 颖 (90)
谈谈“文通精神”	袁子江 (92)
怀人憾事	温少曼 (93)
歼灭木虱的故事	李邦文 (95)
风风雨雨六十年	郑关哲 (97)
怀念与祝福	卢连变 (99)
海之歌——参观《陈吾画展》小记	葆 华 (102)
心中的丰碑——怀念秋野同志	李少芳 (103)
我深深地怀念着你们	李 军 (106)
“文通”与“南国书店”	戈 阳 (107)
怀念挚友张漠青	温少曼 (111)
难忘的港九大队岁月	余绿波 (113)
我的“新华”情结	再 华 (117)

一个有创意的摄影集——麦烽专题

摄影《绿色的风、绿色的阳光》	戈 阳(123)
《摄影画报》出版的缘由始末	麦 烽(126)
饥饿难堪的十七天	肖师韩(132)
辛酸的温馨——英德黄陂“五七干校”偶记	杨 奇(134)
海外赤子情	许南明(140)
难忘的岁月	史 丹(147)
难忘的三月	石 坚(149)
一段往事	林 萍(153)
金婚述怀	李君仪(155)
历尽风霜 吃尽苦头	卢康民(158)
“舔指头、出屁股”的故事	陈予之(160)
在难童中生活的记忆	李 翔(164)
光辉的历程	黄益彰(165)
逃难	莫广智(166)
木薯糍情结	俞述璧(171)
“文通”55 年庆	黄施民(173)
金色十年颂——献给经济特区之歌	卢志刚(173)
忆旧游——怀旧——纪念香港文通成立 60 年	莫广智(177)
献给“九秋”同龄	李庆祯(178)
编后语	(180)
附：广州文通学社复会后历届顾问、理事	(181)

悲欢聚散、情系“文通”

(代序)

戈 阳

(一)

逝水流年，悠悠岁月，回顾往事，对交往五、六十年的故知，总是情牵梦回。尤其是“文通”的友人，偶尔聚首，叙谈往事，对“文通”成立之初，年少之辈，在一起学习、工作，受革命老前辈的思想启蒙，踊跃参加当时宣传、动员全民抗日救亡运动，轰轰烈烈的情景，至今仍历历在目，萦回脑际，倍感革命情谊之亲切、可贵。

今年“文通”成立六十周年，这是一个值得“文通”人隆重纪念的日子。1939年6月，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香港分会在港成立，并于同年8月设立了“文艺通讯部”（后简称“文通”）。“文通”作为当时“文协香港分会”属下的一个组织部分，既由“文协”直接领导，又有一定的独立性。这批年青人，在港英当局统治下，勇往追求革命，十分活跃，颇有影响。尤其于1940年下半年，“文协”先后举办了“文艺讲习班”之后，许多学员在“文协”的组织领导下，成立了“香港青年文艺研究会”（后简称“文研”），成为“文通”的姐妹团体，并肩战斗，使当时的文艺青年活动更添声色和气势。

“文通”一开始就在中共领导下开展工作，最初由陈汉华负责联系；随后，正式成立了党小组，由陈汉华、钟膺、林萤聪三人组成；1940年5月以后，又扩展为党支部，负责“文通”的组织领导工作。与此同时，由杨刚、乔冠华、冯亦代、徐迟、黄绳、黄文俞先后代表“文协”具体指导“文通”、“文研”的学习活动。由于队伍迅速壮大，理事会也相应充实机构，增选了一些人员，先后担任理事的有：林萤聪、袁大顿、徐秋林、黄海燕、张漠青、罗鼎芳、黄德华、何求、蔡郁林、杨奇、麦烽、彭耀芬，以及“文研”的陈汉华、蔡史野、钟膺、李少芳、李伯英、王远威、陈善文、宋因明、王健、李炳琨等。理事分工担

任学习、研究等各个部门的组织工作；同时还委任沈野、廖一原、李一鸣、苏焘、史明等人分头负责中环、湾仔、九龙等五个支站的工作。其后，从1941年5月起，“文通”、“文研”的组织领导，挂两块招牌，由一套人马统率。

“文通”、“文研”在香港的活动，直到日本法西斯发动太平洋战争时止。在党组织安排下，会员分别奔赴抗日战争前线，有的参加了新四军，更多的是到了广东的东江、珠江、粤西等游击区。至此，“文通”、“文研”开展的文艺青年运动才暂告一段落。

前不久，翻阅〈文通联谊〉，重读李少芳一篇悼念余秋野的文章，联想到还有一些在抗日战争战场上牺牲的会员，如黄涛、彭耀芬等；有的在革命工作岗位上积劳病故，有的则在解放后历次的政治运动中遭受迫害而离开人间，如徐歌、李为群、张漠青、陈善文等。

六十年，在一个世纪中，不算很长，也不算短暂，有些往事，可能已依稀朦胧了，但在1939年，由“文协”领导的“文通”、“文研”，是我们终生难忘。当时这批年青人，风华正茂，刚刚跨进社会门槛，开始接触社会，踏上人生道路，并为追求革命的理想，与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同步，与人民共呼吸，同命运，其后又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共患难、同甘苦，承受了各个革命历史时期的风风雨雨，走过许多悲欢聚散的岁月；虽然至今大都白发苍苍，可是仍在革命的道路上迈进。

(二)

“文通”的六十年，扼要地加以概括，是否可划分为“前十年”、“分散期”、“后十五年”三个大段落：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线，从1939年起至1949年，作为“前十年”第一个大段落；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起，直至1983年“文通”在广州复会为止，作为第二个大段落；从1983年复会、成立“文通学社”至今，作为一个大段落。这样划分，也许不很科学，只是为了便于概括、回顾。

这三个时期都有不同特色：“前十年”“文通”身处港英当局统治，抗战期间，参加了抗日救亡运动，其后，又参与、支持正义的人民解放战争，团结、动员进步的文艺青年，与港英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，发挥了突出的作用；“分散期”，虽然已没有“文通”这个组织的组织领导，但成员们仍继承、发扬文通精神，在各级党政领导下，勤勤恳恳地去完成各自的职责，不少人作出了成就和贡献，特别是经受了几十年来大小十七次的政治运动；至于复会后的“十五年”，正处于“文化大革命”之后，拨乱反正，在党的三中全会以后经济大发展改革开放时期，“文通”成员大多数人仍以人民的事业为重，继续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，作出一定的贡献。

“前十年”的经历，已有文集《历史的轨迹》，作了详尽的记载和回顾，就不必赘述了。而长达三十五年的“分散期”，时间跨度很大，“文通”的原来成员均处在各自分散的状况，时至今日，还未见有文章概括表述。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后，原在香港的“文通”“文研”一些会员，以及后来“秋风”新发展的成员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，相当一部分人陆续回到大陆，“秋风”的组织活动也宣告停止。回到大陆的，又各自奔赴新的工作岗位，在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的直接领导下工作，因此，原来“文通”（“秋风”）这个组织，便自然退出历史舞台了。

这三十多年的“分散期”，其间政治运动连年不断，各人毫无例外地、不同程度地被卷进运动中去。在以“阶级斗争为纲”、“不断革命”的政治斗争波涛里，斗争不止，“运动”不断。大家除忙于自己岗位上的业务外，还要忙于应付频繁的政治运动，人们的身心被淹没在政治运动的漩涡中，虽然有时彼此还有联系，却越来越少了，甚至被越来越扭曲的人际关系而完全隔断了。尽管如此，历史铸造的，永远被缅怀的“文通”之情，却长期系于心中。

解放以来，“文通”绝大多数会员都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，满腔热情，埋头苦干地为党工作，如杨奇先后参与广东省党报——〈南

方日报》以及《羊城晚报》的创办和领导工作；陈汉华曾在中共华南分局领导的经济部门担任领导；史野继续在部队担任文艺方面的领导职务；钟膺一直从事教育工作，曾被评为模范教育工作者；许南明多年来担任中国电影出版社社长；李少芳长期在国际新闻和后来的外文出版社任职；沈野也是长期在外文出版部门工作；高建民、莫广智、麦颖坚、徐铿、郭永华、李为群等一直在新闻工作战线担任记者、编辑和组织领导职务；林金枫、李炳琨等先后在县、地的党政部门担任领导工作；史明解放后直至离休前，一直在部队担任领导职务；陈善文、张漠青、廖一原、麦烽、犁青、戈阳等人，一直在文学艺术、摄影、电影工作岗位上搞创作和担任艺术行政领导；徐歌在大学当教授；不少人在离休前后还执笔写作，撰写革命回忆录，发表诗作，研究诗歌理论，如犁青、林金枫出版不少编著。列举上述数例，只是说明“文通”的成员在解放后各条战线上，为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，竭尽自己所能去工作，有的还作出了突出的贡献。他们始终怀抱着对党对人民的革命事业的忠诚，经受长期的历史考验。

然而，在他们当中有些人在“三反”、“五反”、“右反”、“反胡风”、“反右派”、“三面红旗大跃进”、“反右倾”等等政治运动中，尤其在史无前例的“文化大革命”的“十年浩劫”中，却无一幸免，成为“专政”的对象，或被冠以“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”，或成为“三反份子”、“右派份子”，“反党反社会主义份子”，有的成为“臭老九”，长期“靠边站”，或“下放”“劳动改造”，如此种种，被加上莫须有的罪名，在漫漫的三十多年的日日夜夜，承受着错误政治路线、组织路线的“惩罚”。这是对历史真实的极大歪曲！时至今日，人们仍不得不沉思、考量这一历程。在如此的大的历史背景下，如何记述“文通”这一大段“分散期”的具体事实，把被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，作出真实的、公正的历史鉴定？“四人帮”虽已覆灭，党中央对冤、假、错案也大都进行了平反，但是，“四人帮”为何能够

此猖獗、为所欲为地作孽，使全国人民陷入深重的灾难之中？

“文通”的战友们，和全国人民一样，背着这一无可回避的、应当有所思考的历史。戈阳在中新校友会出版的《风雨历程》中发表的《留在新闻纪录片上的脚印》，记述了一点“十年浩劫”中的遭遇，本文集收入的杨奇《辛酸的温馨》，则是以淡淡的革触，从一个侧面为荒唐的“五·七干校”作了三十年祭。虽然都只是一鳞半爪，但也可以从这一滴水中看到那个悲剧年代留下来的一点烙印。相信还有一些战友写过类似的文章，我想，应当把这类回忆文章收集起来，让人们从中记取历史的教训而有所启迪。

(三)

改革开放，透露了一点阳光，令人呼吸到一点舒畅的空气，在如此较为晴朗的天空下，1983年“文通”的复会，说明大家关怀祖国的命运，寄托自己的心愿，为了向前看。战友们的再聚会，缅怀昔日的激情满怀，追求崇高的革命理想，意气风发，踌躇满志，一心为人民革命事业奉献的愿望。正因如此，经受磨难、阻隔和闷郁的心境，一朝得以解放，自然会知过往之可追，而又走到一起来了。

“文通”一复会，许多昔日相知的老前辈和朋友，如徐迟、杜埃、冯亦代、郁风、葛琴、黄绳、黄文俞、黄焕秋、杜宣、沙鸥、林焕平等都欣喜地表示关怀和支持，祝贺这个在四十年前由党组建和直接领导的文艺青年团体的复会。

“文通”复会的组织工作，在原“文协”的老前辈和原“文通”的成员热情支持下迅速开展。同志们珍惜“前十年”的战斗友情，珍惜虽然分散过、但仍维系着的、未曾退色的革命信念。我们悼念不幸的死者，也关怀幸存者，有些战友在暮年还做力所能及的有益于人民的事情，使大家受到深深的鼓舞。“文通”没有衰老和消亡，“文通精神”还活着，复会后这十五年，紧跟随改革开放的步伐，展现它的凝聚力和生命力。

“文通”复会后，首先编印出版会刊《文通联谊》，加强了与散布

在全国各地的原文通成员的联系,并于1984年5月正式成立“文通学社”,成为广州市文联的团体会员。同时,把至今仍留在香港的五、六十个会员联系起来,促成香港支站的成立。“文通学社”现在已有150多个会员,经常参加活动。

学社成立之初,便发动大家写回忆录,或提供史料,编写文通简史,并于1987年出版了一部二十三万字的文集《历史的轨迹》。同年8月,纪念文通成立四十八周年,既《历史的轨迹》的出版,在广东迎宾馆举行座谈会。与会有文化界人士数百人,到会的有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张岳强,和文通当年的老领导杜埃、黄文俞、黄焕秋、梁克寒、卢苇,著名作家秦牧,新闻界前辈许实(微音),市文联的领导,出版界的岑桑等,以及当年在香港一起并肩战斗的兄弟团体的代表。座谈会由会长林金枫主持,由主催、指导文集编辑、出版的名誉会长杨奇向大家介绍文集出版(“文集”在香港出版)的经过。文集的出版和座谈会,被认为是广州文化界的一桩盛事。《历史的轨迹》的出版,受到中共广东省委党史办的重视,杨康华也派专人来索取“文通简史”,视为是四十年代香港党组织领导群运工作的文献资料。

为了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事业,并为开发“文通”的活动经费,“文通”与中国电影出版社、市文联合作,创办了“文生文化服务公司”、“电影书店”;还与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广东分会、广东省归国华侨作家联谊会联合举办了“文通”成员犁青的“犁青作品及《文学世界》座谈会”,参与推动海峡两岸和对外的文化交流活动。香港是“文通”诞生的发源地,当广州人民准备欢庆香港回归,“文通”被邀请参加“庆香港回归筹备工作委员会”工作。

除上述几项主要的工作外,还经常组织“文通”社员举行各种内容的参观访问、文化学习、座谈会和不定期的短途旅游,健康知识讲座,以及为了表示对高龄同志的关怀,举行生日会等等。这些活动,充实、丰富,会员们的组织生活内容,使“文通”成为一个温馨